

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

巩固文化主体性要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党的文化领导权主要体现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内在要求把党的领导落实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巩固文化主体性，必须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党掌握了文化领导权，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为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巩固文化主体性要注重“破”。自西方开启现代化并引领世界现代化后，便建构起“东方从属于西方”的逻辑框架，一方面，把世界各国卷入其中，另一方面，用西方现代化的制度模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把现代化狭义化、固定化、刻板化，导致不少国家对西方现代化机械模仿、盲目崇拜。这种错误认知对我国国内一些人也产生了影响，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想要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缺乏文化自信。只有彻底破除这种错误认知，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才能不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为此，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既不盲从各种教条，也不照搬外国理论，真正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巩固文化主体性要注重“立”，就是立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突破了“西方中心论”，为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提供了实践基础，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立足点。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具有旺盛生命力和强大创造力的生命体。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不断丰富新的文化生命体，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才能不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作者为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深入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及其内在逻辑

韩庆祥

赢，充分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意义。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协和万邦、兼济天下、世界大同、亲仁善邻等精神财富，为促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文化支撑。

“第二个结合”让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有了更广阔的文化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相结合，打开了理论和制度创新更广阔的文化空间。

“第二个结合”使我们掌握思想和文化主动。“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主要是在如何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西方现代化问题上的思想解放，它着力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破除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的文化虚无主义，使我们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发展并充分运用蕴含其中的宝贵资源。这是文化观和文明观意义上的思想解放，重要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摆脱对于西方现代化的盲目崇拜和路径依赖，在于坚定文化自信，使人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

“第二个结合”有助于我们探索面向未来的创新。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是我们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的根本前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并结合时代要求推陈出新，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能够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面向未来的创新，朝着新的文化生命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所引领的方向推进，朝着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人类谋进步所确定的方向推进，朝着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所指定的方向推进。

“结合”造就了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新的文化生命体是具有总体性、根本性的标识性概念。

新的文化生命体之“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魂脉之统摄，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之基因，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生成的一种新成果。

新的文化生命体之“文化”，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主张在不同文化形态之间形成一种相互补充、彼此共生的关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新的文化生命体之“生命”，是哲学意义上的“生命”，意味着这种新的文化形态茁壮成长、朝气蓬勃、充满活力。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在吐故纳新中不断实现自我更新，持续推动文化创新发展。

新的文化生命体之“体”，既是一个系统的“整体”，也是具有主体性的“主体”。作为系统的“整体”，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作为具有主体性的“主体”，区别于“西体中用”和“中体西用”之争中的“体”，

强调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主体。

把握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品格

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这既彰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品格，也明确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意义。所谓体，主要是指习近平文化思想之理；所谓用，主要是指依理据来指导具体的文化工作，体现为理论之用和实践之用。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之用，体现在解构“西方中心论”，破除文化虚无主义，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打开思想文化的创新空间，巩固文化主体性。“西方中心论”奉行“东方从属于西方”的逻辑框架，把西方世界看作“主”，把非西方世界看作“客”，强调“主统治客”。习近平文化思想则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主体”和“基石”，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走出并解构了“西方中心论”。“古今中西之争”，“古今”是历史时间问题，“中西”是历史空间问题，涉及如何科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古为今用，破除了文化虚无主义，着力破解“古今”问题；立足中国式现代化，注重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着力破解“中西”问题。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之用，体现在以独特的文化形态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奠定深厚文化根基，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供厚重文化滋养，为促进和发

展、合作共赢提供丰厚文化支撑。

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强调要“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华文化”，充分彰显了我们的历史使命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示了文化坐标、锚定了文明航向。

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必须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工作，这是基础和前提，目标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推动文化繁荣是在“繁荣”层面谈文化，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它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基础。没有文化繁荣，就建不成文化强国；没有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导向作用，推动文化繁荣就会迷失方向。

建设文化强国是在“强国”层面谈文化。文化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文化实力不仅关系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而且关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美好生活。建设文化强国，就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文化主体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有效纠治执法司法中个别趋利性行为

徐剑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公正司法是法治的生命线”。执法司法公不公，公正的执法司法有没有制度保障，决定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成色，是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着眼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就“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作出战略部署。受利益驱动的执法司法中个别趋利性行为，严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是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营造更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必须着力解决好的问题。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是因为法治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能够塑造稳定、透明、可信赖、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是激发企业创新发展活力的重要条件，也是我国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石。执法司法中个别趋利性行为滥用了法律管辖权，对企业违规实施异地查封、扣押、冻结、划转等财产强制措施，侵犯了企业特别是一些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损害了市场预期，不仅严重破坏了法治环境，也严重破坏了营商环境，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有效配置与市场活力的充分迸发，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

执法司法中个别趋利性行为为具有复杂多元的成因，可以说是经济社会发展、案件管辖制度、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驱动等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在我国，一般由违法犯罪的行为发生地或者结果发生地的执法司法机关管辖案件。数字时代，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与经济活动深度融合，越来越多的交易行为发生在网络空间，或者在网络空间留下痕迹，导致对地域管辖的法律解释变得更为宽泛。比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信息网络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信息网络犯罪案件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这个犯罪地包括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网络服务使用的服

器所在地，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在地，被侵害者的信息网络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犯罪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者其他涉案人员使用的信息网络系统所在地，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以及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等。复杂的地域管辖制度，在提高办案便捷性与灵活性的同时，也让滥用法律管辖权的行为有空可钻。此外，个别地方的执法司法罚没收入是其地方财政的一大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该地执法司法产生趋利性、逐利性倾向。

有效纠治执法司法中个别趋利性行为，需要多措并举、常抓不懈。关键是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一方面，要聚焦队伍建设，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不断加强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素质能力建设，以执法司法人员坚守法治、秉公办案的实际行动，让经营主体在每一个执法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另一方面，从源头和长远看，更重要的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要在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加快改革步伐，完善案件管辖制度，探索建立管辖权异议制度，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跨区域协作机制；要完善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制度，加强对罚没收入的立体动态监督，严格规范罚没收入使用，强化对罚没收入异常增长、大额罚没收入的监督，斩断执法司法中个别趋利性行为的利益链条，铲除“罚没经济”的生存土壤。

（作者为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有的放矢

激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奋进力量

——读《强信心 促发展》

赵义良

近日，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2024年通俗理论读物《强信心 促发展》出版发行。该书立足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关切，紧密结合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聚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集中回答了如何理解“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深厚意蕴、如何认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目标任务等9个热点问题，推动科学理论与干部群众关切精准对接，奏响了一曲强信心、促发展的理论强音。

注重用深厚的学术思想“讲道理”

时代是思想之母，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反映，是时代精神的写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产生这些体系的时代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推动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等多个方面系统谋划、全面部署改革，形成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论场”“方向标”“施工图”。该书聚焦“深水区改革该如何推进”“新质生产力‘新’在何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何在”“收入分配怎

样更公平”等理论问题，综合运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思想范式，讲深讲透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大道理”，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从理论上深入了解党中央的顶层设计、战略蓝图、改革方法、制度政策背后的“大逻辑”。

注重以鲜明的实践导向“解决问题”

理论因问题而成，问题以实践为基。实践是最鲜活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辉煌历史，既是一部以实践为基础推动理论创新的历史，也是一部以实践为导向不断瞄准和解决问题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每一次变革，无不以我们党坚持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为前提和基础。该书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基层实践经验，以鲜明的问题意识聚焦干部群众之问，用“九张问题清单”切入经济、文化、科技、民生等领域的问题，系统回答了干部群众关心的思想觉醒、经济发展、民生福祉、社会心态、文化遗产、逆全球化等热点问题，深刻阐释了“问题”背后的“道理”、“道理”背后的“情理”，诠释了党中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决策部署背后的大学问，

有助于廓清一些认识误区。

注重从国际比较的视野“看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见证了东方大国创造的发展奇迹。步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谋发展，既从中国视角看待世界发展，又从世界全局审视中国蓝图，在国内国际的双重时空维度中思考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成为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不变的稳定力量”。新时代新征程，向国际社会敞开怀抱的中国正在与世界各国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该书把“中国奇迹”置于世界变局中考察，用中国日益扩大的“朋友圈”、越织越密的“伙伴网”，阐释了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打造“合作丰碑”，奏响了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大合唱”，从高质量发展本质意蕴出发论证了中国发展的内生优势和外部势能。

注重从宏阔的历史纵深“强信心”

历史是一面镜子，能启迪心灵、增强信心。如果没有中华文明深沉而厚重的历史纵深，就没有中

国特色，也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而深远的历史纵深，从而增强了我们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该书把中国奇迹、中国之理、中国之路、中国之治置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考察，以史讲理、以史明志、以史铸魂，从历史纵深体现了“中国之制”的历史逻辑，从历史维度呈现了“两个结合”的宏大格局，从历史视野展现了“中国之治”的美好前景，从而增强了新时代促改革、谋发展的坚定信心。该书以“两个结合”切入破题，标示了理解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文化坐标，既以宏大的历史格局标示了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标尺，也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标示了理解未来中国的历史标尺。

总之，该书抓住广大干部群众所思、所想、所困、所惑的日常关切，用一个个鲜活的真实案例，形象勾勒出可圈可点、立体全面的中国改革图景，阐释了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系统性谋划、整体性部署，架起了党的创新理论直通于干部群众的“知心桥”，必将激发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奋进力量。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新书推介